中国赴东南亚读博者的路径选择逻辑与群体差异
——基于学术资本的质性研究

THE LOGIC OF PATHWAY CHOICE AND GROUP DIFFERENCES AMONG CHINESE STUDENTS PURSUING DOCTORAL STUDIES IN SOUTHEAST ASIA: A QUALITATIVE STUDY BASED ON ACADEMIC CAPITAL

邓可煜[1*], 邓磊[2]

Keyu Deng[1*], Lei Deng[2]

[1,2]泰国正大管理大学泰华国际学院

[1,2]International Chinese College, Panyapiwat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Thailand

Received: April 7, 2026 / Revised: July 17, 2026 / Accepted: July 27, 2026

摘要

研究目的：在高校教师队伍“博士化”和博士学位门槛强化背景下，赴东南亚读博成为部分中国在职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现实选择。本文旨在分析其路径选择逻辑及群体差异。

研究设计/方法/途径：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和扎根理论策略，基于 30 名中国赴东南亚读博者及博士毕业生的深度访谈资料展开编码分析。

研究结果：研究发现，赴东南亚读博并非简单的留学目的地替代或低门槛学历补位，而是在制度压力、路径可达性、家庭——工作责任与自我发展期待交织下形成的策略性选择，其过程表现为压力触发、机会识别、路径比较、成本权衡、风险估算和决策确认。根据主导动因与初始学术资本差异，受访者可归纳为学术追求型、制度压力型、经济理性型和家庭——工作兼顾型四类。

创新性与价值：研究认为，相似制度背景下的行动差异，源于个体初始学术资本、职业处境、家庭责任和风险承受能力的交互作用。

关键词：学术资本 路径选择 东南亚博士 跨国博士教育 群体差异

*Corresponding Author: Keyu Deng
E-mail: dengkeyu7800@foxmail.com

Abstract

Purpos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doctoralization" of China's academic workforce and the growing credential function of doctoral degrees, pursuing doctoral study in Southeast Asia has become a viable option for some Chinese in-service teachers and education practitioner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ir pathway choice logic and group differences.

Study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 Using a qualitative approach and a grounded theory strategy, the study analyzes in-depth interview data from 30 Chinese doctoral students and graduates who pursued doctoral degrees in Southeast Asia.

Finding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is pathway is neither a simple substitution of study destination nor merely a low-threshold route to credential acquisition. Rather, it is a strategic choice shaped by institutional pressure, pathway accessibility, family–work responsibilities, and expectations of self-development.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volves pressure triggering,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pathway comparison, cost weighing, risk assessment, and decision confirmation. Based on primary motivations and initial academic capital, participants are classified into four ideal types: academically oriented, institutionally pressured, economically rational, and family–work balancing.

Originality/Value: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differentiated actions under similar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result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initial academic capital, occupational situation, family responsibility, and risk tolerance.

Keywords: Academic Capital, Pathway Choice, Southeast Asian Doctorates, Transnational Doctoral Education, Group Differences

引言

21 世纪以来，全球高等教育流动格局在“中心——边缘”结构持续分化的同时，也呈现出新的区域性调整趋势。传统欧美国家仍占据博士教育流动中的核心位置，但一些非传统留学目的地正在区域合作深化、教育国际化推进和办学供给扩张的背景下进入博士生流动视野 (Altbach & Engberg, 2014)。与此同时，国际学生流动持续增长，博士阶段国际学生的集中度更高，亚太区域的资格互认和跨境高等教育合作也在不断加强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25;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Organization [UNESCO], 2025)。在这一背景下，东南亚国家凭借较为灵活的培养安排、相对较低的留学成本以及较近的文化与地缘距离，逐渐成为部分中国学生攻读博士学位的重要去向。

这一变化并不只是留学目的地的替代，更与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内部的人才评价逻辑、职业竞争结构及发展机会重组密切相关。近年来，随着高校教师队伍学历结构持续提升和岗位竞争不断强化，博士学位日益被部分在职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视为影响高校招聘、职称晋升、岗位稳定与职业延展的重要资格条件。对大量已经在职、同时承担家庭责任与职业压力的教师和教育

工作者而言，博士教育不再只是单纯的学术训练过程，而越来越成为资格补足、职业延展与发展机会重组的重要路径。在这一现实情境中，东南亚博士教育之所以受到关注，并不主要因为其象征意义上的“替代性”，而在于它为部分个体提供了一条在多重约束中仍可推进的发展路径。

如果仅从学历获取或一般意义上的留学动机来理解这一现象，显然是不够的。对中国赴东南亚读博者而言，真正值得追问的问题并不只是“为什么去”，而是他们为何会在多重结构约束下将东南亚博士教育理解为一条值得投入的路径，以及这一判断如何与其对博士学位、学术训练和未来发展机会的想象相联系。从这一意义上说，赴东南亚读博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流动问题，而是一个与制度环境、职业处境、家庭责任和资本期待交织在一起的发展决策问题。

学术资本视角为解释中国学生赴东南亚读博现象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分析工具。相较于通常用于解释教育投资收益、技能积累与劳动力市场回报的“人力资本”概念，“学术资本”更能把握博士教育深度嵌入学术场域与组织评价体系的特殊性。博士教育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能力训练或学历提升，而是围绕知识生产、学术规范、组织认可与身份形成展开的复合过程。个体在其中获得的并不只是可度量的知识与技能，还包括研究规范、学术表达方式、导师背书、同行网络、项目声誉以及学位合法性等具有场域属性和评价依赖性的资源。本文以布迪厄的资本理论为基础，借鉴高等教育研究中关于 Academic Capital 与 Doctoral Capital 的讨论，将“学术资本”界定为个体在特定学术场域及其相关评价场域中，通过博士培养、知识生产、学术社会化与跨场域互动所积累，并在一定条件下获得学术共同体、组织制度与职业评价体系认可，进而转化为发展机会、职业位置与身份优势的资源总和 (Bourdieu, 1986; Naidoo, 2004; Walker & Yoon, 2017; Smith & Walker, 2024)。对于中国赴东南亚读博者而言，博士学位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并不只因为它是一张学历证书，更因为它被理解为能够重塑职业位置、提升学术身份和争取发展机会的制度化文化资本。

研究目的

基于此，本研究主要回答以下问题：

1. 在博士学位门槛持续强化、国内读博机会有限以及工作与家庭责任并存的情况下，部分中国在职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为何会将东南亚博士教育视为一条现实可行的发展路径？

2. 在相似的制度背景和现实约束下，不同个体为何会形成差异化的路径选择逻辑？

围绕这两个问题，本文并不将赴东南亚读博理解为单一的留学目的地选择，也不将其简化为低门槛学历获取行为，而是将其视为个体围绕博士学位这一制度化学术资本进行机会识别、路径比较与风险权衡的策略性决策过程。本文关注的重点不是对东南亚博士路径作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判断，而是解释个体如何在特定职业场域、家庭责任和学术资本期待之中，将这一路径理解为一种可以进入、可以推进，并可能转化为后续发展机会的行动方案。

文献综述

国际学生流动研究

国际学生流动一直是高等教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相关研究较早从人口迁移与教育流动的角度讨论学生为何跨越国境接受高等教育，其中推拉理论长期构成解释留学目的地选择的重要框架。既有研究从高等教育质量、经济发展水平、奖学金制度、文化相近性、语言邻近性和地理距离等方面，较为充分地识别了影响国际学生流动的关键因素 (Mazzarol & Soutar, 2002)。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学生流向发达国家的研究中，推拉理论较好揭示了来源国教育机会不足、目的地国教育资源优越、就业回报更高等因素如何共同作用于留学选择。

但基于推拉理论的国际学生流动研究仍有明显局限。其一，现有研究对推力与拉力因素的识别较多，但对这些因素之间的层次关系、作用机制及其相对重要性缺乏更深入的整合。其二，研究重心长期放在发展中国家学生向发达国家的纵向流动上，对发展中国家之间、区域内部以及非传统目的地之间的横向流动关注不足。Lee (2017) 有关中国学生赴韩国留学的研究已提示，国际学生流动并不只是 “由南向北” 的单向迁移，也存在明显的区域间相互流动逻辑。其三，在解释层面，既有研究更多从政治、经济与教育等宏观维度分析流动现象，对个体如何在多重现实约束下进行策略性判断关注不够。推拉理论能够解释东南亚为何会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留学目的地，但对于哪些人会选择这一路径、他们是在何种制度约束下作出判断、又如何将这一选择转化为现实行动，仍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近年已有研究开始直接关注中国学生赴东南亚发展中国家攻读博士的决策过程。Li et al. (2025) 指出，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发展中国家，正成为部分中国学位申请者的 “替代性博士路径”；Zheng et al. (2026) 进一步从情境化视角分析了中国学生赴东南亚发展中国家攻读博士的决策过程；Zheng (2026) 则讨论了中国学生赴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读博过程中的学习经历类型分化与形成机制。这些研究为理解该现象提供了重要基础，但现有成果要么更偏向推拉因素或决策情境分析，要么更偏向学习经历与适应问题，对 “学术资本——策略性路径选择——群体差异机制” 的整合解释仍有拓展空间。

博士生培养与发展研究

与国际学生流动研究相比，国内博士生培养与发展研究更关注博士教育内部的制度安排、培养过程与成长机制。近年来，相关研究的重心已逐渐从招生制度、培养体制和学位授予规范，扩展到博士生在培养过程中的学术成长、研究训练、导生关系、学术归属感、身份建构以及学业完成状况等方面。已有研究普遍认为，博士生发展并不是由课程学习和学位完成构成的线性过程，而是一个受到制度环境、导师支持、学术共同体融入、研究能力训练以及个体背景差异共同影响的复杂过程 (Gardner, 2008; Weidman et al., 2001)。

这一研究取向为理解博士培养提供了重要基础，但其典型研究对象仍主要是国内培养

体系中的全日制博士生。相比之下，中国赴东南亚读博者作为一种嵌入职业岗位、家庭责任与跨国流动现实的非传统博士群体，其经验并不局限于校内培养，而是贯穿留学决策、跨国培养与回流再配置的连续路径。若直接套用一般博士生发展研究框架来解释中国赴东南亚读博现象，容易把这一群体的经验过度缩减为“培养阶段的问题”，从而忽略其路径选择本身所具有的制度性和策略性。Golde (2005) 与 Lovitts (2002) 的研究也提示，博士生的发展结果并不能仅用学生个体能力解释，而与院系制度、学科文化和组织支持密切相关。这意味着，对于嵌入职业、家庭与跨境流动情境中的在职博士群体，更需要从前置决策与结构约束出发理解其博士路径。

学术资本视角

要更充分地解释中国赴东南亚读博者的行动逻辑，有必要引入学术资本视角。与强调教育投资收益和劳动力市场回报的人力资本概念相比，学术资本更适合把握博士教育这一深度嵌入学术场域及组织评价体系的特殊过程。博士教育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能力训练或学历提升，而是围绕知识生产、学术规范、组织认可与身份形成展开的复合性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体获得的并不只是可度量的知识与技能，还包括研究规范、学术表达方式、导师背书、同行网络和学位合法性等具有明显场域属性与评价依赖性的资源 (Bourdieu, 1986; Naidoo, 2004)。

从这一视角出发，博士学位之所以成为中国部分在职教育工作者高度重视的目标，不仅因为它能够带来学历提升，更因为它在高校职业场域中承担着制度化文化资本的功能。它既关系到能否进入或留在高校竞争序列之中，也关系到研究能力提升、学术身份形成和后续发展机会的重组。正因为如此，中国赴东南亚读博者并不是在做一个抽象的出国留学决定，而是在围绕博士学位这一制度化文化资本进行资源判断、路径比较与风险权衡。

学术资本视角的另一价值在于，它能够把“路径选择”与“群体差异”联结起来。并不是所有面临博士化压力的人都会选择东南亚路径，也不是所有选择东南亚路径的人都基于同一判断标准。不同个体在初始学术资本、家庭责任承担和职业处境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会影响其对不同读博路径的比较方式与风险偏好。因此，赴东南亚读博并不是同质化决策，而是不同类型个体围绕学术资本获取形成的差异化路径选择。

通过上述文献梳理回顾可以看到，国际学生流动研究能够为理解东南亚博士路径提供宏观背景，博士生培养与发展研究能够为分析博士成长机制提供重要参照，但两者都不足以单独解释中国赴东南亚读博者这一特定群体的路径选择逻辑。前者更擅长解释“哪些国家更具吸引力”，后者更擅长解释“博士生在培养过程中如何发展”，而本研究所关注的，恰恰是嵌入制度门槛、职业竞争、时间成本与家庭责任之中的个体，为何将东南亚博士教育识别为一条现实可达的发展路径。

因此，本研究将学术资本作为核心分析视角，不把赴东南亚读博仅仅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留学目的地选择，而是将其视为个体围绕博士学位这一制度化文化资本所作出的策略性路径

决策。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动因结构与初始资本起点差异出发，分析不同个体何以形成不同的路径选择类型。

本文并不将“学术资本”仅作为说明博士教育价值的宏观概念，而是将其操作化为读博者在路径选择阶段形成的三类资本期待。

1. 制度化学术资本期待，主要指个体希望通过博士学位获得学历认证、岗位准入、职称晋升、人才评价和组织认可资格。对于在职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而言，博士学位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历提升，而是进入或维持高校职业竞争序列的制度化资格。

2. 能力型学术资本期待，主要指个体希望通过博士培养补足理论基础、研究方法、论文写作、学术表达和问题意识等方面的不足。这类期待并不直接表现为证书获得，而是指向博士学习过程中研究能力和学术身份的生成。

3. 关系与声望型学术资本期待，主要指个体希望通过院校声誉、项目口碑、导师支持、同侪网络、跨国学习经历和学位合法性获得身份认可与机会拓展。这一维度尤其能够解释为什么受访者在选择东南亚博士路径时，不仅比较学费和时间，也会反复考虑学校层次、认证风险、社会评价和回国后的组织认可。

这三类期待的区分并非凭空设定。Bourdieu (1986) 在讨论文化资本时曾指出，它并非一个同质性的概念，而是以制度化状态（学术资格与文凭）、身体化状态（内化的知识、能力与惯习）和客观化状态（文化物品）三种形式存在。本文所区分的三类资本期待——制度化学术资本期待、能力型学术资本期待、关系与声望型学术资本期待——三者分别对应博士学位的资格功能、研究训练的能力生成，以及院校声誉与学术网络带来的象征增值，正是从布迪厄这一框架中获得的启发。后续关于“博士资本”的讨论 (Walker & Yoon, 2017) 也表明，博士阶段的资本积累本就是多面向的复合过程，而非单一的学历获取。在此基础上，将学术资本操作化为三类期待，是为了更精确地捕捉不同个体在决策阶段对博士路径所承载的不同价值维度的差异化判断。

据此，本文所分析的并不是博士毕业后已经形成的资本存量，而是读博者在决策阶段围绕未来学术资本可能获得、被承认和被转换所形成的预期判断。成本、时间和学习形式等因素在本文中并不构成独立的人力资本解释框架，而是个体判断学术资本获取路径是否可达、可承受和可转换的重要条件。

而要将上述三类资本期待落实到具体的路径选择分析中，还须先厘清一个前提性问题：东南亚博士教育作为一个跨国学术场域，其运行规则究竟有何特殊性？这里的“特殊性”无关培养质量的高低，而是指该场域在准入条件、培养节奏和资格认证等层面，呈现出一种不同于国内学术场域和欧美传统留学场域的规则组合。

先看准入规则。国内博士招考以严格限额和激烈竞争著称，欧美名校则对研究计划与

学术背景设有严苛筛选，相比之下，部分东南亚博士项目在语言成绩、入学考试和前置学历要求上留有更大的弹性空间。恰恰是这种弹性，使得那些学术资本存量不足、却面临明确职业资格压力的在职申请者，获得了进入博士培养通道的可能。再看培养过程的安排。该场域中许多项目采用集中授课、假期制或模块化形式，实质上构建了一种“非连续性”的培养节奏。这直接回应了在职群体无法长期脱产的结构性约束，使博士学习得以嵌入既有的职业与家庭秩序之中，而非取而代之。至于学位资格的效力，问题则更加微妙。东南亚博士学位的最终价值并不完全由该场域内部的标准决定，很大程度上要看它能否通过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认证，以及能否被国内高校的职称评审体系所接纳。换言之，该场域的一条核心运行逻辑是“外部合法性优先于内部声望”——个体在选择时，首要权衡的往往不是项目在东南亚本土的学术口碑，而是那张学历证书回国之后究竟“管不管用”。

这三重规则交织在一起，使东南亚博士教育在中国部分在职教师群体眼中呈现为一种独特的机会结构：它既提供了国内和欧美路径难以比拟的可达性，又将认证风险与组织认可的不确定性转嫁给了个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所分析的“路径选择逻辑”，本质上就是个体在解读上述场域规则之后，对其可行性、成本与风险所作出的差异化判断。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取向，以扎根理论作为主要研究策略，对中国赴东南亚读博者的路径选择逻辑进行分析。之所以采取这一方法，是因为赴东南亚读博并不是由单一变量驱动的教育选择问题，而是生成于制度门槛、职业竞争、家庭责任、时间成本与发展期待相互交织的复杂情境。若仅依赖定量研究对若干影响因素进行变量化测量，固然能够识别某些统计意义上的相关关系，却难以深入揭示个体如何在多重约束下进行现实判断、路径比较与策略性选择。相比之下，质性研究更有助于进入受访者的经验世界，把握其行动逻辑、情境解释与意义建构过程。

本研究的经验资料主要来自对 30 名赴东南亚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博士生或博士毕业生的深度访谈，并结合相关文本资料进行辅助分析。研究采用目的抽样与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式确定受访者，以尽可能覆盖不同国家、不同院校类型、不同学科及不同职业背景。访谈资料经清洗整理后形成可分析文本，为遵循保密原则，本文统一以 A1-A30 进行匿名编号。

在资料收集方式上，研究者于 2024 年 11 月至 2025 年 1 月期间以面对面访谈和在线视频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半结构式深度访谈。访谈并非围绕单一问题展开，而是重点追踪受访者从“决策赴东南亚读博——进入项目——适应培养环境——理解博士学习意义与职业规划”的连续经历。访谈提纲在资料收集过程中根据前期访谈中显现出的新议题不断调整，以便在“边访谈、边分析、边修订”的过程中持续强化对核心问题的追问。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 Participants

No.	Gender	Age	Duration	Education	Field	Work Background	Institution
A1	Female	35	1 year	211 BA+MA	Ethnic Policy	Public university (resigned)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public)
A2	Male	29	2 years	Non-211/985	Communication	Private university	Krirk University (private)
A3	Male	34	3 years (graduated)	Non-211/985	Regional Economics	Public university	Rajamangal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awan-ok (public)
A4	Male	32	3 years (graduated)	Non-211/985 BA; 211 MA	Education	Public university (resigned)	UCSI University (private)
A5	Female	29	3 years	Non-211/985	Education	Private university	Mahasarakham University (public)
A6	Female	31	3 years (graduated)	Non-211/985	Music	Public university	Mahidol University (public)
A7	Male	33	3 years	Non-211/985	Educational Management	Public university	Panyapiwat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private)
A8	Female	31	3 years	211 BA+MA	Educational Management	Public university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public)
A9	Female	30	3 years	Non-211/985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ublic university	Dhurakij Pundit University (private)
A10	Male	33	3 years	Non-211/985 BA; Thai MA	Educational Leadership	Public university	Assumption University (private)
A11	Female	33	3 years	Non-211/985	Educational Management	Public university	Panyapiwat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private)
A12	Male	43	1 year	Non-211/985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ublic university	Dhurakij Pundit University (private)
A13	Male	31	3 years	Non-211/985	Education	Public university	UCSI University (private)
A14	Male	30	3 years (graduated)	211 BA+MA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ublic university	INTI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ivate)
A15	Female	31	4 years (graduated)	Non-211/985 BA; Thai MA	Management	Public university	Asia Pacific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Innovation (private)
A16	Male	32	3 years (graduated)	Non-211/985 BA; Italian MA	Educational Managemen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Panyapiwat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private)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 Participants (Cont.)

No.	Gender	Age	Duration	Education	Field	Work Background	Institution
A17	Female	34	2 years	Non-211/985	Management	Public university	Shinawatra University (private)
A18	Female	29	3 years (graduated)	Non-211/985	Music Education	Private university (resigned)	University of Perpetual Help System DALTA (private)
A19	Female	27	4 years (graduated)	211 BA; UK MA	Education	Public university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public)
A20	Female	29	4 years (graduated)	211 BA+MA	Sociology of Education	Public university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public)
A21	Female	30	4 years (graduated)	211 BA; UK MA	Education	Public university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public)
A22	Male	39	2 years	Non-211/985	Educational Leadership	Public university	Assumption University (private)
A23	Female	29	3 years	Non-211/985 BA; UK MA	Educational Management	Public university	National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public)
A24	Female	37	5 years (graduated)	211 BA+MA	Cultural and Arts Management	Public university	Burapha University (public)
A25	Female	30	3 years	Non-211/985 BA; 211 MA	Sociology of Education	Public university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public)
A26	Male	34	2 years	Non-211/985 BA; 211 MA	Communication	Public university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public)
A27	Female	28	3 years (graduated)	Non-211/985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ublic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the Visayas (private)
A28	Male	34	3 years (graduated)	Non-211/985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ivat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Perpetual Help System DALTA (private)
A29	Female	36	3 years (graduated)	Non-211/985	Art Studies	Public university	Krirk University (private)
A30	Male	40	3 years (graduated)	Non-211/985	Education	Public university	Bulacan State University (public)

在资料分析上，本研究主要遵循开放编码、主轴编码与选择性编码的基本步骤。首先，通过对访谈文本进行开放编码，提取受访者在谈及读博动因、现实约束、路径比较和发展期待时所呈现的概念单元；其次，在主轴编码阶段，将相互关联的概念整合为若干更高层次的范畴，如制度压力、路径可达性、时间协调和自我发展愿望等；最后，在选择性编码阶段，围绕“学术资本期待下的策略性路径选择”这一核心命题，对各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统整。

Table 2 Formation of Core Categories (Selected Examples)

Open Coding	Axial Coding	Core Category
Promotion to academic rank; hard threshold for position competition; anxiety about the doctoral opportunity window; need for security in an established position	Institutional pressure and opportunity structure	Strategic pathway choice under expectations of academic capital
Competition for domestic doctoral admission; scarcity of quotas; cost-benefit trade-offs; institutional/program reputation endorsement	Pathway accessibility and input-output trade-off	
Non-full-time study; appeal of intensive teaching sessions; need for stable family income; inability to interrupt employment	Study arrangement compatible with family and work responsibilities	
Perceived weak academic foundation; desire to strengthen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research competence; pursuit of researcher identity	Aspirations for self-development and imagined academic identity	

研究结果

基于对 30 名受访者访谈资料的整理与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中国赴东南亚读博者并非由单一因素驱动，而是在制度门槛、路径可达性、家庭与工作责任以及自我发展诉求等多重因素交互作用下形成现实选择。进一步分析表明，受访者虽然作出了相似的留学选择，但其出发点、判断逻辑与路径理解方式并不相同。本文据此从两个层面展开研究结果：一是概括中国赴东南亚读博者的主要路径选择逻辑；二是在此基础上分析群体类型差异及其形成机制。

从资料分析结果看，赴东南亚读博并不是若干动因的简单叠加，而是一个逐步生成的路径确认过程。多数受访者首先在职称晋升、岗位聘任、学校升格、同侪比较或职业不确定中感知博士学位的必要性；随后通过同事经验、导师推荐、校际合作、熟人渠道、中介信息或单位政策识别东南亚博士路径；继而在国内博士、欧美博士、港澳博士和东南亚博士之间比较申请门槛、学习周期、经济成本、语言要求、培养方式、家庭承受能力、学历认证和项目声誉；最后在单位报批、家庭支持、专业选择和导师联系等环节中确认具体项目。

因此，东南亚博士路径并不是一次孤立的目的地选择，而是个体围绕博士学位这一制度化学术资本进行机会识别、路径比较、成本权衡和风险估算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制度压力”解释博士学位何以变得必要，“路径可达性”解释东南亚何以进入行动选项，“家庭与工作约束”解释个体为何难以选择长时间脱产路径，“自我发展愿望”则解释部分受访者为何不满足于单纯获得学历，而是期待借博士学习重建研究能力和学术身份。

1. 制度性压力与机会结构：学历门槛、晋升压力与窗口期焦虑

对多数受访者而言，读博决策的起点并不是单纯的学术兴趣，而是高校教师队伍“博士化”背景下不断增强的制度门槛压力。随着博士学位在高校招聘、职称晋升和职业流动中的基础性资格作用不断上升，硕士学历已越来越难以支撑其长期职业发展。博士学位不再只是提升竞争力的附加资源，而被普遍理解为维持职业发展连续性的重要前提。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读博首先被嵌入受访者对职业“天花板”、岗位安全与发展前景的现实判断之中。正如受访者 A2 所述:“本来没有想这么快就读博，但很现实的原因就是学校领导跟我说，你不读博士就只能转型了。转型是什么意思？懂得人都懂。”这种单位内部非正式的“通牒”，虽还未形成书面文件，却在事实上构成了对其职业未来的明确指向——继续留在高校体系的前提是获得博士学位，否则只能被迫“转型”。

从学术资本视角看，这种压力本质上反映了博士学位作为制度化文化资本在高校职业场域中的门槛化效应 (Bourdieu, 1986; Naidoo, 2004)。当学历要求被深度嵌入岗位竞争和职称制度之后，是否拥有博士学位，已不只是“能否更进一步”的问题，而首先关乎“能否继续留在竞争序列之中”。受访者 A8 和 A17 分别谈到:“虽然在国内读可以保证我的学历背景，但什么时候能读上就完全不确定。就算读完我年纪也不算小了，也超过了 35 岁，这还是没考虑延毕的情况下，学校里面已经有一些老师去马来西亚还有泰国读博的，反正我就告诉自己不能再这么焦虑下去了，趁现在学校里面博士还算稀缺资源，赶紧去马来西亚读吧，理想中的学术背景可能终究只能是理想了。”（A8）“读博士完全就是被推着走的。学校最新职称评审办法规定了副教授评审‘原则上须具备博士学位’，院里近两年获批副高的全是博士。”（A17）这些带有明显情境色彩的表述，集中体现了博士化制度压力如何将“读博”推入个体的现实发展议程。这类叙述表明，对部分受访者而言，制度门槛压力并不只是抽象的政策背景，而是通过年龄焦虑、岗位竞争和组织评价等因素，具体压缩为“必须尽快行动”的现实判断。

2. 路径可达性与投入产出权衡

如果说制度化学历门槛解释了“为什么必须考虑读博”，那么东南亚路径的相对可达性则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是东南亚”。对大量在职教育工作者而言，国内博士教育在学术声望与制度合法性层面，具备更为显著的优势，但其招生竞争激烈、培养周期较长、脱产要求较严，往往与既有职业位置和生活秩序形成较大冲突。相较之下，东南亚博士项目因成本相对较低、培养安排较为灵活、文化与地缘距离较近而呈现出更强的可达性。根据受访者描述，到东南亚读博并非单纯因“便宜”而作出选择，而是在比较国内、欧美与东南亚等不同路径之后，基于投入产出、时间安排和风险可控性形成了对东南亚路径的现实判断。这一判断并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成本收益计算，更是一种综合性的生涯比较。

受访者 A6、A10 和 A21 的叙述比较有代表性:“很大的程度上因为泰国这边的预算，

对我而言是能够承受的……别的国家也很贵，留学这件事情它就是很贵，不是你考虑来不来，是你的经济情况允不允许你来。我们的人生好像有很多选择，但其实我们并没有那么多选择。泰国不嫌我穷，我还能嫌他破吗？这起码还有 QS 的排名。”（A6）“在这边读时间更可控，差不多是国内学校的寒暑假时间开学又是集中授课，可以节约成本。我不能完全放弃当前工作，好不容易有个编制的工作，不能因为读博说放弃就放弃。在这边读博就能做到平时都正常在国内工作，等国内放假了这边新学期也开始了，然后就过来集中上课和导师当面交流。”（A10）“就我而言大马的学校相对好申请，可能我英语好，硕士又是英国读的，关键这边学费和生活费比英国、欧陆确实更便宜，起码我能负担得起，一对比就知道这边性价比拉满，对于有家庭的人这是必须要考虑的。”（A21）对在职教师而言，投入不仅包括学费、生活费和交通支出，也包括时间占用、岗位变动风险、家庭协调成本以及未来学位能否转化为职业机会的不确定性；产出则不仅仅是“拿到学位证书”，还包括资格补足、岗位竞争力提升、职业发展延展和学术身份的可能增值。正是在这种综合权衡中，东南亚博士教育才从一个区域性留学选项转化为一条现实的发展路径。

3. 家庭与工作可兼顾的进修路径

对于多数已经在岗、已婚或承担子女照料责任的受访者而言，攻读博士学位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围绕个人学习展开的选择，而是深度嵌入家庭责任、职业稳定与收入安排之中的综合性决策。对很多受访者而言，读博并不只是个人发展议题，更关乎家庭运转与职业延续之间如何重新协调。也正因此，能否在培养过程中较为妥当地兼顾家庭责任与工作岗位，成为其评估不同读博路径时非常现实、也极具约束力的衡量标准。正如受访者 A12 所言：“我年纪也不小了，平时要照顾家庭和辅导孩子学习，实在抽不出精力了……但是呢，今年学校领导找我谈话两次了，一边是学校要升职业本科必须要有足够的师资力量，还直接跟我明说‘不读博士，就算你业务再好，未来你专业负责人的位置也会被新引进的博士替代掉的’……以我现在的工作岗位和家庭压力，选择寒暑假时间到这边读博是最优选择。”

东南亚博士路径之所以能够进入部分在职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行动方案，并不是因为他们对跨国流动本身具有更强偏好，而是因为这一路径在时间结构和培养组织方式上较好地回应了其生活世界中的现实边界。根据受访者描述，部分东南亚博士项目采用集中授课、阶段性驻校和假期安排等培养方式，这使一部分受访者得以在维持当前工作、保留基本收入和兼顾家庭责任的前提下推进博士学习。其中比较典型的如受访者 A20 提到：“虽然我们家还没有孩子，爱人也支持我出来读博，但是出于家庭责任的考虑，或多或少会有点心理负担。我这个人比较有忧患意识，不能接受太长时间的脱产或者说停薪留职去读博。即使爱人有稳定收入，但我们是一个家庭，家里需要稳定收入。这边的学校不强制要求脱产就读，所以到这边读博就不用中断工作同时也兼顾了家庭责任。”

上述材料说明,“可兼顾”并不是一个抽象优点，而是受访者在家庭财务安排、岗位稳定性和时间结构之间反复衡量后，对东南亚路径所作出的现实判断。因此，东南亚博士教育对他们而言，不再是一种必须以长时间脱产、显著收入中断和家庭秩序失衡为代价的高风险选择,而是一项可以通过精细安排与持续协调加以推进的发展项目。

4. 自我发展愿望与学术身份想象

受访者的留学决策并不完全是对外部制度压力的被动回应，其中也包含较为明确的自我发展愿望与学术身份想象。部分受访者希望借读博补足既有学术训练的不足，系统掌握理论与研究方法，逐步建立自身的知识体系与研究能力。正如受访者 A3 所分享:“除了高校这边的学历的硬性要求这个因素以外，再就是想通过读博士来补足一下自己的学术基础，希望在学术、科研方面能进一步得到提升，主要是想补上过去学术训练缺失的一课。”还有一些受访者并不满足于单纯“拿到一个博士学位”，而是更在意通过博士培养获得作为“研究者”或“学者”被承认的可能性。正如 A25 所言:“我相信肯定有人到这边读博是觉得找到了比国内读博更轻松的路径，但这种轻松只是一种表面的轻松，或者说仅仅是入学方式的轻松。……像我这样跨专业读的只能自己下去努力，自学相关的资料把欠缺的知识补上，这个学习过程就很真实……我就是想通过在 K 大学读博成为一名博士，而不是只为了获得一个博士学位。”

访谈资料表明，东南亚路径之所以被选中，并不只是因为它更可达，还因为它被部分个体理解为一条仍然能够通向“学术成长”的现实通道。博士教育的意义不只是获得一张文凭,而是借此突破原有知识边界，重塑自身与学术之间的关系。这一表述提醒我们，受访者的决策并不只是围绕学历补位展开，其中也包含着对系统研究训练、学术能力提升和研究者身份形成的主动追求。正因如此，赴东南亚读博既包含工具性动因，也包含发展性诉求；正是这两类力量的交织，使其路径选择具有明显的复杂性。

5. 基于动因结构与学术资本起点的群体类型划分

在上述路径选择逻辑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主导动因”和“初始学术资本”两个维度进行类型化分析。这里的“主导动因”并不是指个体只有一种动机，而是指在制度压力、自我发展、成本计算和生活协调等多重因素交织时，哪一类因素在其决策中居于主导地位;“初始学术资本”则主要指个体在进入博士路径之前所拥有的学历背景、研究训练、学术兴趣、论文发表、学术网络和组织位置等资源条件。

Table 3 Ideal Types of Pathway Choice among Chinese Doctoral Students in Southeast Asia

Type	Primary Motivation	Initial Academic Capital Profile	Criteria for Pathway Evaluation	Typical Decision-Making Logic	Subsequent Orientation in Doctoral Training
Academically Oriented Type	Academic interest; self-development; aspiration for a researcher identity	Relatively strong initial academic capital, or a strong intention to compensate for prior academic insufficiencies	Whether the pathway facilitates knowledge-system building and research capacity development	Using the Southeast Asian doctoral pathway to restart or continue an academic trajectory	More active accumulation of competence-based and prestige-based academic capital
Institutionally Pressured Type	Promotion to academic rank; job stability; credential supplementation; career transition	Richer teaching or administrative experience, but relatively limited research-related academic capital	Whether the doctoral credential can be obtained in a timely manner	Completing the doctoral degree within a policy window to meet institutional qualification requirements	Investment centered on graduation, academic rank promotion, and credential conversion
Economically Rational Type	Cost-benefit consideration; time efficiency; controllability of completion	Limited resources and relatively low risk tolerance	Whether the pathway is accessible, affordable, and completable	Acquiring doctoral-level academic capital within an affordable cost range	Greater emphasis on visible academic outputs and minimum completion requirements
Family–Work Balancing Type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retention of current employment; role balance	Varied academic foundations, but clearly fragmented time availability	Whether the pathway avoids disrupting existing family and occupational arrangements	Preserving developmental opportunities while managing multiple roles	More phased and nonlinear progression in doctoral study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类型划分并非对 30 名受访者进行互斥式统计归类，而是基于理想类型方法，对访谈材料中较为突出的主导动因、资本期待和路径判断进行分析性概括。从典型个案看，A3、A25 较集中体现出学术追求型特征，主要强调学术基础补足、研究能力提升和研究者身份建构；A2、A8、A17 较集中体现出制度压力型特征，主要围绕学历门槛、职称晋升、岗位稳定和组织要求展开路径判断；A6、A10、A21 较集中体现出经济理性型特征，主要关注学习成本、时间可控、申请可达和毕业风险；A12、A20 较集中体现出家庭——工作兼顾型特征，主要强调家庭责任、收入稳定、工作保留和学习安排的可协调性。现实中，部分受访者可能同时具有多重动因，例如职称压力、经济成本、家庭责任和学术发展期待往往交织在同一决策过程中。因此，类型划分的意义不在于否认经验复杂性，也不是对受访者进行固定标签化处理，而在于揭示不同主导动因和初始学术资本结构如何影响其路径判断和后续投入方式。

6. 共同制度压力下的群体差异形成机制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赴东南亚读博者确实共同面对博士学位门槛强化、国内读博机会有限、职业竞争加剧和家庭责任难以抽离等现实约束。但共同制度压力并不必然生成同质化行动。制度压力只是进入读博决策的外部触发条件，真正决定个体如何理解东南亚博士路径的，是这一压力与个体初始学术资本、职业处境、家庭责任和风险承受能力之间的交互关系。

首先，初始学术资本差异影响个体对博士路径的价值判断。已有较好学历背景、研究训练或明确学术兴趣的受访者，往往并不满足于“拿到博士学位”本身，而是更重视博士学习能否带来研究能力提升、学术表达训练和研究者身份建构。因此，这类受访者更容易形成学术追求型路径理解。相反，既有科研积累较弱、但已经处于高校岗位评价或职称晋升压力中的受访者，则更容易将博士学位理解为进入或维持职业竞争序列的制度性资格，从而形成制度压力型路径理解。

其次，职业处境差异影响个体对路径可达性的判断。对于岗位稳定性较弱、职称晋升窗口临近或单位学历结构要求提升的受访者而言，博士学位具有更强的时间紧迫性。此时，东南亚路径的意义不只是“可选择”，而是“能够在有限时间内启动并完成”。因此，路径判断的核心不再是理想化的学术声望最大化，而是能否在政策窗口期内取得被组织承认的博士资格。

再次，家庭责任和经济条件差异影响个体对风险的承受方式。对于经济资源有限、家庭收入不能中断或需要承担照料责任的受访者而言，长时间脱产、收入中断和高额留学成本都会显著放大读博风险。东南亚博士路径之所以被纳入行动方案，是因为其相对灵活的学习安排和较低的经济成本，使其能够嵌入既有家庭和职业秩序之中。由此，经济理性型和家庭——工作兼顾型并不是简单的“低成本选择”，而是在有限资源和多重角色约束下对学术资本获取路径的现实配置。

最后，风险承受能力差异影响个体对声望折价和转换不确定性的处理。选择东南亚博士路径的受访者普遍意识到，该路径在学术声望、公共评价和回流认可方面可能面临不确定性。但不同类型个体处理这种不确定性的方式不同：学术追求型更倾向于通过论文、会议、导师网络和研究能力积累抵消声望不足；制度压力型更依赖原单位政策、职称规则和组织承诺；经济理性型更关注学历认证、毕业可控和投入产出边界；家庭——工作兼顾型则更依赖稳定组织环境中的内部转换空间。

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相似制度背景下，受访者仍会形成四类差异明显的路径选择逻辑。群体差异并不是制度背景差异直接导致的，而是共同制度压力与个体初始学术资本、职业位置、家庭责任和风险承受能力交互作用的结果。东南亚博士路径在不同个体那里承载的学术资本期待并不相同：对学术追求型而言，它是研究能力补足和学术身份重建的通道；对制度压力型而言，它是制度资格补位的通道；对经济理性型而言，它是成本可控的博士资本获取通道；对家庭——工作兼顾型而言，它是在不打破生活秩序前提下保留发展机会的通道。

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赴东南亚攻读博士学位不能简单理解为传统推拉理论意义上的目的地选择。本研究并不否定推拉理论对国际学生流动研究的解释价值。东南亚博士路径之所以能够进入受访者视野，确实与目的地国家较低成本、较近地缘距离、较灵活培养安排和较高申请可达性有关。但如果仅以推拉理论解释这一现象，容易把赴东南亚读博理解为目的地吸引因素和来源地排斥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难以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同样面对博士化压力的人并不都会选择东南亚路径，为什么同样选择东南亚路径的人又会形成不同的行动逻辑。

本文的补充在于，将留学目的地选择问题进一步推进为学术资本获取路径问题。受访者并不是在抽象地比较国家或院校，而是在具体职业场域和生活处境中判断：哪一条博士路径更可能帮助自己获得制度资格、补足研究能力、维持职业连续性，并在未来组织评价中实现一定程度的资本转换。由此，东南亚博士路径的形成，不只是外部推力和拉力的结果，更是个体围绕博士学位这一制度化学术资本进行路径配置的过程。

这一发现与既有国际学生流动研究构成了两层意义上的对话。首先，它延续并补充了有关区域内部流动和非传统留学目的地的讨论。已有研究指出，国际学生流动并不只是发展中国家流向欧美中心国家的单向迁移，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内部流动与替代性路径选择 (Lee, 2017; Li et al., 2025)。本研究的分析进一步表明，东南亚博士路径的形成并不是单纯的目的地替代，而是在中国高校教师队伍“博士化”进程和个体生活世界的双重约束下生成的一种策略性路径选择。其次，本研究也扩展了对非传统跨国博士教育的理解。相较于将赴东南亚读博简单界定为“低门槛选择”或“成本导向行动”，本研究更强调这种路径在制度环境中的相对可达性，以及受访者如何围绕博士学位这一制度化文化资本进行资源判断和行动安排。

本研究的第二个重要发现，是中国赴东南亚读博群体路径选择不能由单一动因概括，而是在共同制度背景下形成了不同的路径理解方式和行动逻辑。学术追求型、制度压力型、经济理性型与家庭——工作兼顾型四类理想类型表明，同样选择赴东南亚读博，并不意味着他们有着相同的出发点。有人更看重研究能力提升和学术身份形成，有人更强调岗位规制和资格补位，有人侧重投入产出与风险控制，也有人更关心在不打乱既有生活秩序的前提下完成博士培养。类型分析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把“为什么赴东南亚读博”这一问题从因素罗列推进到了“不同个体如何理解同一路径”的层面。

从博士教育研究的角度看，对在职跨国博士生群体的理解不能只停留在培养阶段内部。传统博士生发展研究更关注课程学习、导生关系、学术社会化和学业完成等培养过程问题 (Gardner, 2008; Weidman et al., 2001)，而本研究所揭示的是，在嵌入职业责任与家庭责任情境中的在职跨国博士生群体身上，博士发展首先表现为一条前置于培养阶段的路径选择问题。个体何以选择、如何进入以及以何种方式理解博士路径，本身已经构成博士发展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路径选择阶段形成的学术资本期待并不意味着博士学位获得后能够自动兑现。对已毕业受访者的补充观察表明，东南亚博士学位回流后仍需经过学历认证、单位认定、组织需求匹配和成果识别等环节，才可能进一步转化为职称晋升、岗位流动、待遇调整或学术身份提升。博士学位本身只是学术资本转换的入口，而不是发展结果的保证；其后续转化效果仍取决于资本类型、组织评价规则和具体职业场域之间的匹配程度。

应当说明的是，本文对“场域规则”的分析，其着眼点始终停留在路径选择阶段——即个体如何在决策过程中解读和评估这些规则。至于个体进入该场域后所积累的学术资本，在回流中国高校职业场域时究竟经历怎样的组织认定、制度筛选与价值重估过程，已属于博士培养完成后的资本转换问题，涉及另一层面的经验材料与分析框架，超出本文的研究边界。本文所能揭示的是：恰恰由于上述场域规则的存在，个体在决策时形成的“入口判断”本身就已内含着对后续转换可能性的预期与估算，而这种预期正是路径选择逻辑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就此而言，本文关于路径选择的分析，只是理解非传统跨国博士教育发展过程的一个前置环节，后续仍需结合培养经历和回流转换进行持续追踪。

总结

本文以中国赴东南亚读博者为研究对象，基于 30 名受访者的深度访谈资料，从学术资本视角分析其路径选择逻辑与群体差异。研究形成如下结论：

1. 赴东南亚读博并非单纯的留学去向选择，也不是简单的低门槛学历补位，而是博士学位门槛强化、国内读博机会有限、职业竞争加剧、家庭责任难以抽离和自我发展期待交织作用下形成的策略性路径选择。在这一过程中，东南亚博士路径被部分在职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理解为一种现实可达的学术资本获取通道。

2. 赴东南亚读博的路径选择具有清晰的生成过程。受访者通常经历压力触发、机会识别、路径比较、成本权衡、风险估算和决策确认等环节。制度压力使博士学位变得必要，路径信息使东南亚博士教育进入可选方案，成本与时间结构影响路径可达性，学历认证、项目声望和组织认可则构成风险估算的重要内容。由此，东南亚博士路径并不是被动选择的结果，而是个体在有限条件下围绕制度化学术资本进行路径配置的过程。

3. 中国赴东南亚读博者路径选择不能由单一动因概括。学术追求型、制度压力型、经济理性型和家庭——工作兼顾型四类理想类型，分别体现了不同个体在主导动因、初始学术资本、职业处境、家庭责任和风险承受能力上的差异。相似制度背景之所以生成不同路径逻辑，关键在于共同压力被不同个体的资本起点和生活处境重新转译为不同的学术资本期待。由此，对中国赴东南亚读博现象的理解，不宜停留在一般留学动机解释或学位价值判断上，而应转向对路径选择机制、群体差异及资本转换条件的综合分析。

建议

1. 实践建议

基于本文的分析，相关高校和教育管理部门在看待赴东南亚攻读博士学位群体时，有必要超越简单的标签化判断，更加关注其培养经历、学习投入与实际发展表现。在师资培养和人才评价过程中，组织不宜只以留学目的地对博士学位作简单区分，而应结合培养过程、学术成果、研究能力和岗位匹配度进行综合判断。对于拟赴东南亚攻读博士学位的个体而言，除学历获得本身之外，也应更加重视研究训练、导师支持、学术网络和成果积累，以增强博士学习过程中的资本形成质量和后续发展的可转化性。

2. 研究局限

1）样本结构具有一定边界。本文受访者主要为赴东南亚攻读博士学位的在职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因此研究结论更适用于理解嵌入职业责任、家庭责任和高校评价压力中的在职读博群体，不宜直接推论至所有中国赴东南亚博士生。

2）资料来源以访谈材料为主，虽然研究过程中结合了部分政策文本、项目资料和受访者提供的背景信息进行辅助分析，但对不同高校、不同地区和不同单位具体政策文本的系统收集仍不充分。因此，本文关于制度压力和组织认可的分析，主要呈现受访者如何感知和解释制度环境，而不是对所有相关制度文本进行全面比较。

3）本文主要基于特定时间段内的横截面访谈资料，尚未能完整追踪受访者从入学、培养、毕业到回流后的长期变化。特别是不同类型读博者在培养过程中的学术资本积累方式、毕业后的组织认定过程以及职业结果分化，仍需要后续研究进行纵向追踪。

3. 未来研究方向

未来研究可在三个方向上继续推进：一是扩大样本类型，将非在职博士生、不同国家和不同院校层级的博士项目纳入比较；二是加强政策文本、院校项目文件和组织评价规则的系统收集，以提高制度分析的外部支撑；三是开展纵向追踪研究，进一步考察不同类型个体在跨国培养、回流认定和资本转换中的动态变化。

References

Altbach, P. G., & Engberg, D. (2014). Global student mobility: The changing landscape.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77), 11-13. https://doi.org/10.6017/ihe.2014.77.5676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 G.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pp. 241-258). Greenwood Press. https://home.iitk.ac.in/~amman/soc748/bourdieu_forms_of_capital.pdf

Gardner, S. K. (2008). Fitting the mold of graduate school: A qualitative study of socialization in doctoral education. *Innovative Higher Education, 33*, 125-138. https://doi.org/10.1007/s10755-008-9068-x

Golde, C. M. (2005). The role of the department and discipline in doctoral student attrition: Lessons from four departments.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76*(6), 669-700. https://doi.org/10.1080/00221546.2005.11772304

Lee, S. W. (2017). Circulating east to east: Understanding the push-pull factors of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Korea.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1*(2), 170-190. https://doi.org/10.1177/1028315317697540

Li, X., Dai, K., & Zheng, Y. (2025). Alternative paths to a PhD? Factors influencing Chinese degree-seekers to choose Southeast Asian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learning destination.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30*(1), 120-140. https://doi.org/10.1177/10283153251356212

Lovitts, B. E. (2002). *Leaving the ivory tower: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departure from doctoral study*. Rowman & Littlefield. https://www.bloomsburycollections.com/monograph?docid=b-9798216409847

Mazzarol, T., & Soutar, G. N. (2002). "Push-pull" factors influenc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 destination cho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16*(2), 82-90. https://doi.org/10.1108/09513540210418403

Naidoo, R. (2004). Fields and institutional strategy: Bourdieu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inequality and socie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5*(4), 457-471. https://doi.org/10.1080/0142569042000236952

Smith, S., & Walker, D. (2024). Scholarship and academic capitals: The boundaried nature of education-focused career tracks.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29*(1), 111-125. https://doi.org/10.1080/13562517.2021.1965570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25). *What are the key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 (Education Indicators in Focus No. 88). https://doi.org/10.1787/2a423a76-en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Organization [UNESCO]. (2025, November 28). *Asia-Pacific countries strengthen cooperation on fair and transparent recogni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qualifications*. https://www.unesco.org/en/articles/asia-pacific-countries-strengthen-cooperation-fair-and-transparent-recognition-higher-education

Walker, J., & Yoon, E. (2017). Becoming an academic: The role of doctoral capital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 Development, 36*(2), 401-415. https://doi.org/10.1080/07294360.2016.1207616

Weidman, J. C., Twale, D. J., & Stein, E. L. (2001). *Socialization of graduate and professional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A perilous passage?* (ASHE-ERIC Higher Education Report, Volume 28, Number 3). Jossey-Bass. https://eric.ed.gov/?id=ED457710

Zheng, Y. (2026). Adap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ypological differentiatio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transnational doctoral learning experiences—A qualitative study of Chinese students pursuing doctorates in Southeast Asia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48*(2), 31-60. https://link.oversea.cnki.net/doi/10.20013/j.cnki.ICE.2026.02.04 [in Chinese]

Zheng, Y., Dai, K., & Hardy, I. (2026). Pursuing a doctoral degree in Southeast Asia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textualising Chinese students'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61*(1), e70504. https://doi.org/10.1111/ejed.70504



Name and Surname: Keyu Deng
Highest Education: Doctoral Candidate
Affiliation: International Chinese College, Panyapiwat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Thailand
Field of Expertise: Educational Management



Name and Surname: Lei Deng
Highest Education: Doctoral Degree
Affiliation: International Chinese College, Panyapiwat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Thailand
Field of Expertise: Higher Education